



# “多样性”与环境社会学的学科视野<sup>\*</sup>

## ——第四届东亚国际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述评与解读

张虎彪，王 曼

(河海大学 社会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环境社会学 20 世纪诞生于美国并成为一门显性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东亚地区是社会、文化多样性最典型的地区之一，东亚各国或各地区面临的环境问题及解决的方式也具有多样性。但由于历史和地理方面的原因，东亚地区的环境问题及其解决方式仍有诸多相似之处。环境社会学家也在不断地建构环境社会学这门学科，并积累了一定的成果。为了加强交流，共同构建东亚地区的环境社会学学科，2013 年 11 月在河海大学举行了以“多样性：环境与社会”为主题的第四届东亚国际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国家或地区的学者在研讨会上围绕着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影响以及应对措施等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多样性；东亚；环境社会学；综述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4)08-0158-04

环境社会学的兴起与人们对环境问题凸现与环境保护实践的反思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有学者称环境社会学彰显“自反性”关怀。东亚地区是社会、文化多样性最典型的地区之一。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东亚地区日益突出多样化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引发了多种社会问题，东亚各地区正在努力为本国或本地区探寻环境问题的应对策略，环境社会学者们也在理论上进行了一定的回应。

近年来，东亚环境社会学家之间的交流不断加强。东亚环境社会学网络是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等地区的环境社会学家进行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最初成立于 2007 年 7 月在北京由中国人民大学和河海大学联合举办的国际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东亚环境社会学网络先后在日本法政大学(2008 年)、台湾清华大学(2009 年)和韩国加图尔大学(2011 年)等地举办了三届东亚国际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2013 年 11 月 2-4 日，河海大学、江苏省社科联、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等单位承办的第四届东亚国际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南京举行。来自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家的高校及科研机构的 80 余名学者与会，60 多位学者在大会发言。会议主要围绕着以下 7 个议题进行了讨论。

### 一、环境社会学的理论

环境社会学的兴起与人们对环境问题凸现与环境保护实践的反思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东亚地区是社会、文化多样性最典型的地区之一。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东

亚地区日益突出多样化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引发了多种社会问题。

目前中国的环境社会学理论研究主要对党和政府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作出理论上的回应。洪大用从中国环境问题的新趋向及所处的国际背景出发，提出了全面科学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它内在地包括生态建设与社会建设两大方面，其实质是通过社会建设促进生态建设；它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双重超越；体现了以人为本，实际上强调了发展的目的应当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

日本的环境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跟其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饭岛伸子(Iijima Nobuko)是日本环境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提出并发展了“受害结构论”。友泽悠季(Tomozawa Yuuki)(日本立教大学)对饭岛伸子的“公害”(kogai)概念的发展进行了阐述，并认为“受害”(damage)的分析框架不局限于解释过去的事件和问题，不局限于地理和规模或某一方面或维度，它对潜在的不确定的灾难造成的痛苦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具有理论普适性。

福島核电站灾难是日本前所未有的事件，对日本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船桥晴俊(Harutoshi Funabashi)(日本法政大学)运用系统论和控制论的知识对福島核电站灾难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该灾难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其损失太大以至于我们无法确定损失的上限，但仍可以通过建立一个

<sup>\*</sup>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CSH01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012B09314)。

作者简介：张虎彪(1974-)，男，湖南双峰人，社会学博士，河海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王曼(1989-)，女，江苏徐州人，河海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生。



五个维度的模型来说明其受害结构: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重建五个维度的环境是对灾难受害者进行的必要补偿,为此他提出一种新的解决方式——“先避难后回归”,这需要通过长时间的生活系统恢复和一系列政策的支持。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包括公共话语领域,科学研究领域,政策计划制定领域和决策领域,因此更好地将公正和平等的价值观念融入政策制定程序之中,通过公共话语领域的发展实现这四个领域更高效地组合,是日本未来发展的方向。

面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危机的加重,“生态现代化理论”试图通过对经济政策系统的革新和高效利用自然资源来克服危机,而持“代谢断层理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则批判生态现代化理论忽视了资本主义进行资本积累的目的,这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危机。李尚勋(Sang-Hun Lee)(韩国韩神大学)认为首尔绿色增长倡议网络(SINGG)为实现这两种理论的沟通提供了一些新的视野。与地理背景紧密结合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将有利于填平“生态现代化理论”与“代谢断层理论”之间的鸿沟。

环境健康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科学研究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社会科学关注的问题。随着近年来“癌症村”的曝光率日益增多,环境污染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了社会科学家(包括社会学家)关注的议题。陈阿江(河海大学)以淮河流域的“癌症村”为研究点,以“内”、“外”两个视域为分析框架,实地调查发现,孟营村民的癌症既与外源污染有关,也与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有关。研究发现“内”“外”关注重心的差异影响了对疾病认知及应对行动的平衡。这种从“内”“外”来关注环境健康问题产生的原因具有社会学方法论上的意义,突破了单一从自然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研究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不仅仅要保持客观性,还需要有一定的价值立场。李时载(See-Jae Lee)(韩国加图尔大学)以自身的实践和研究经历为例对环境社会学者的价值观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环境社会学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科学,参加社会运动是环境社会学家的一种道德责任。在环境冲突解决的过程中学者要充当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也要采取科学知识和方法来探索环境问题。但在当今社会中,学术共同体越来越依赖研究资金赞助,因此面临着失去价值中立、无法保证研究客观性的学术道德风险。

## 二、生态与社会

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反映了人与人的关系。胡伟(东南大学)以古村为例,从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农田水利灌溉方式变迁的角度透视“天人关系”的近代转型。研究发现,无论修建水利工程的动机是集体化时期“政治任务”还是市场经济时期“私人利益”,都是人类对自然的剥夺,当然人类也必然遭到自然的报复。森明香(Sayaka Mori)(日本一桥大学)则解释了为何“受益最多的地区”的居民要反对 Kawabe-river 水坝建设项目。日本中央政府为防洪投资该工程,而最大的反对声却来自洪灾严重的(Hitoyoshi city)。研究发现,其反对的原因是 kuma 河的景色和水流不仅能

满足人吉市居民生活的需求,更是第三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而且,在长期与洪水对抗的过程中,当地居民已经知道如何减少洪水带来的损失而不必过多地依赖水坝建设。金泽谦太郎(Kentaro Kanazawa)(日本信州大学)运用社会链理论(Social link theory),通过与东亚文化密切联结并具有高市场价值的沉香木贸易,研究亚洲热带雨林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类要与大自然形成“血-肉”关系(Flesh-and-Blood(namami)Relationship),仅仅依靠政治和经济规制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社会经济链(Socio-economic Link)和宗教文化链(Religio-cultural Link),对生产地区详细信息进行追溯有利于消费者形成道德的判断和行为,这样人类文化与自然生产力之间就能达到一种平衡。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与社区的地域文化传统相结合。王俊敏(苏州大学)借助社区理论和生态人类学视角,将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结合起来,挖掘和更新社区的“地域”要素所蕴含的意义,将“乡村生态社区”重新解释为建立在社会性“天人合一”理论在传统乡村生态社区的具体落实。并以此来重新审视乡村社区的衰落与重建,认为新农村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有机结合。野田岳仁(Takehito Noda)(日本早稻田大学)以日本高岛市滋贺县(Takashima City, Shiga Prefecture, Japan)Harie 村庄为例说明当地社区志愿者组织是如何处理环境保护和社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发现,社区志愿组织不以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追求最优化的村民生活质量和解决好社会矛盾。柴玲(中央民族大学)以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北方的三个农村的水资源管理为例分析了中国水资源管理的分权与合作(Decentralization and Cooperation)的历史过程。研究认为,在水资源的管理中,只有处理好政府和社区居民之间的分权,才能实现对水资源的合理和可持续的使用,实现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

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不仅要经济的角度来考虑,还要考虑社区居民的生计模式、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等方面。隋艺(河海大学)和李勇进(兰州大学)分别从农民生计来讨论环境政策或规划的实施。隋艺运用推拉理论对影响青海省三江源区 X 村的生态移民迁移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尽管生态移民政策取得了成效,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该最大限度地解决好移民就业问题,尽快建立生态移民补偿机制,使他们真正能够“移下来,住下去”。李勇进以 2007 年“石羊河流域的重点治理规划”的实施为例,认为此规划的实施使得甘肃民勤县的生态环境发生改变,但从可持续生计的角度看,当地农民却无法有效应对这种变化。环境保护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仍是一个难题。刘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王旭辉(中央民族大学)则从社会结构或文化的角度来讨论环境补偿政策的实施或资源的开发问题。刘伟在对 C 基金会四川省 G 州 HZS 社区保护地项目的研究中发现,传统的生态补偿方式在进入青藏高原的藏族社区后,遭遇补偿方式单一、补偿成本核算困难、经济补偿的文化悖论、生态补偿的能力不足等难题。研究认为,生态补偿在藏族地区的实施以“协议保护”为核心理念,构建起一整



套嵌入于当地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的生态补偿模式,以避免和减少传统生态补偿方式的缺陷和不足。王旭辉(中央民族大学)则认为“脱嵌”是民族地区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的典型特征。民族地区脱嵌型资源开发面临四个关系性难题:开发与保护、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外部主导与当地参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为了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只有解决资源开发中的社会性嵌入问题,才能促进中国民族地区内源性发展和兼容性发展。

### 三、环境风险

当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正在跨入一个环境高风险时代。如何认识环境风险产生的原因及其带来的影响,也成为了社会学家们关注的热点。

王芳(华东理工大学)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环境风险进行了解读,复合性是目前中国环境风险的最主要特点,表现在历时态环境风险共时性存在,结构性环境风险过程化表现,累积性环境风险突发性爆发,以及并发性环境风险高频度涌现。因此为了应对它,也必须构建“复合型”环境治理模式。张玉林(南京大学)和陈涛(中国海洋大学)则从某一个方面来分析具体风险的产生机制。张玉林以山西的煤炭开采为例来研究灾害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的形成以及治理危机。这种灾害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与中国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诸多缺陷交织到一起是密不可分的。陈涛以渤海溢油事件为例分析了环境污染在社会舆论、环境抗争等层面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并呈现系统性、连锁性、复杂性和潜伏性等特征。这也在制度创新、产业布局调整和海洋环境意识等层面对政府的重视程度产生了积极的倒逼机制。环境风险的分布还是一种社会地位的体现。龚文娟(厦门大学)围绕着中国北京、重庆和厦门等三个城市垃圾处理污染这一紧迫的社会问题分析了环境风险分布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分化的影响已渗透到风险社会各领域,反过来,环境风险的分布也进一步强化了阶层的分化。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使得一些受害赔偿难以兑现。宇田和子(Kazuko Uda)(日本专修大学)在研究中发现 1968 年日本 Kanemi 石油病事件由于政府免责条款,食品企业缺乏财政资源、难以确定谁中毒与中毒等原因,难以在受害者和公司负责人之间达成任何协议使得受害者无法得到相应水平的补偿,因此提出应由法律设立应对食物中毒所造成的损害的赔偿基金。

### 四、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更多还原

随着环境问题的凸现,东亚地区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也在不断地觉醒。环境牺牲意愿(WTS)通常被定义为一个人能够为环境保护做出牺牲的准备或水平。陈艳艳(日本同志社大学)从金钱牺牲、生活舒适牺牲、增加义务等方面比较了日本、韩国、中国(北京和杭州)等国家不同的环境牺牲意愿水平和特性。顾金士、陈芳(河海大学)则研究了 JZ 社区居民对外源慢性“空气污染”的归因认知问题。研究发现,以互联网为支撑的虚拟社区是居民进行日常环境反抗的沟通平台和有力武器。居民对空气污染的责任归因主要源

于自身的经验常识、实地调查和居民之间的意见传导等内部因素,及环保部门、新闻媒体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社区居民与环保部门的归因差异和持续污染引发了相互间的信任危机,但社区内部自组织力量的增强与居民普遍自我无力感的矛盾又使居民形成了既依靠政府又质疑政府的纠结心态。范叶超(中国人民大学)使用 2010 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对中国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具有不同的社会基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心具有重要影响,但却不能显著预测乡村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环境知识变量对城乡居民的环境关心差异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

亲环境行为与居民日常的消费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金恩智(Eun-Ji Kim)、尹宣真(Sun-jin Yun)(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提出发展一个新的指标——“消费文化”,来弥补以往对消费水平(consumption scale)关注的不足。“消费文化”指向那种具备消费对环境的影响的知识、对消费引起的对环境带来损害的敏感度、根据消费计划做出合理的决定的消费素养。根据这一新的指标,在同等条件下,女性、高收入者、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不比其他入更具亲环境行为。田美永(Miyoung Jeon)(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等提出“心理淘汰”(Psychological obsolescence)这一概念来研究消费的影响因素。心理淘汰指故意给产品设计一个有限的使用周期,来诱导消费者再次消费。研究发现,磨损率对消费者更换产品造成的影响取决于消费者的特点,如年龄、收入、对新产品推出周期的感知、对高价的感知和物质观等方面。

垃圾围城已经是中国城市地区面临的巨大挑战。化解垃圾围城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便是垃圾分类实践,但这对于具有浅层次的环境意识和行为的中国城市居民又是一个大的挑战。石超艺(华东理工大学)分析了上海市徐汇区梅陇三村以退休女性居民为主体的“绿主妇”垃圾初次分类模式,认为通过社区领袖引领、社区认同推进、趣味活动吸引、社会名声激励的行为逻辑使得垃圾初级分类模式顺利推进成为可能。史明宇(河海大学)则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来分析 N 市垃圾分类收集的现状及其运作逻辑。他认为在构建城市垃圾分类收集处理的行动者网络中,要重视传统习俗和当地知识,政府在行动者网络中发挥积极引导的功能。

### 五、NGO 与环境抗争

与日常生活中的环境行为不同,NGO 与环境抗争中的议题则主要属于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民间环保组织是环境保护中的重要力量。张萍(中央财经大学)梳理了近十年来的环保组织介入环境事件的典型案例,发现我国环保组织在环境事件中的介入模式经历了三个发展变化阶段:依靠媒体动员、介入环境纠纷助力维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张虎彪(河海大学)则以 C 市环保协会的行动策略为个案,说明在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中,一个主要成员脱胎于体制内的环保 NGO,如何通过合法性的建构赢得政治机会空间的。研究发现,此环保 NGO 之所以能对政府采取既合作又监督的行动策略,关键在于其核心成员所具有的两栖身份(既是人大代表又是民间环保组织负责人)。





近年来,环境冲突或环境抗争运动产生的原因及其表现的方式也具有多样性。皇甫明(HwangBo Myung)(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等以韩光(Hanbit)核电站热废水的环境冲突研究为例,认为冲突的三个主要焦点是热废水的损害程度、热废水减少方法和补偿的过程。热污水冲突尚未解决是由于各利益相关者缺乏沟通、彼此失去信任及不确定性的法律限制依然存在等因素造成的。罗亚娟(河海大学)基于中国江苏北部地区农民环境抗争行为的经验研究提出了“情理抗争”的研究范式,即农民抗争的行为理据、策略选择和目标制定都在乡村情理框架内。这种行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源自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行为惯性的影响。司开玲(淮北师范大学)则从“权力-话语”的角度对农民的环境抗争进行解读。她认为,在农民的环境抗争中,是否能够有效地证明自身的污染以及污染受害,将关系到农民环境权益的维护,这个过程恰恰是一系列科学证据的呈现过程。然而,更为重要的困境来自于地方权力对科学的干涉。

## 六、气候变化与环境政策

全球气候变化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各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等)在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基础上决定他们对气候变化政策、减排政策的态度。郑泰尹(Dai-Yeun Jeong)(韩国亚洲气候变化教育中心)对此提出气候变化政策建立要依赖四大主体,政府通过制定政策,企业通过绿色管理,环保组织通过环保运动,以及公民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环保行为来应对气候变化。研究认为,不同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必须促进抗风险能力建设,对内要加强财政、实用性技术、社会共识、当前的消费主义的文化精神等方面的建设,对外要建立国际合作网络和信息交流平台。

COMPON (Comparing Climate Change Policy Networks, PI: Jeffrey Broadben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SA)是一个国际气候变化政策的比较研究网络,旨在探讨不同国家或社会围绕气候变化政策的决策制定过程,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不同国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反应,以寻求全球性解决方案。野泽淳史(Atsushi Nozawa)(日本明治大学),根据来自 COMPON 日本项目的数据发现了不同行动者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态度,认为一些公司面对公民和政府部门的压力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被迫支付更多成本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池田和弘(Kazuhiro Ikeda)(日本上智大学)基于 COMPON 项目的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和偏好,研究了日本气候变化政策的政治决策制定过程和利益相关者网络。调查发现,大多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在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辰巳智行(Tomoyuki TATSUMI)(日本一桥大学)在研究气候变化政策制定中的利益相关者网络所发挥的阻力和推力作用时发现,政府在网络中始终处在气候变化政策的合作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研究认为,合作网络与组织的类型密切相关,尤其是气候变化政策和政策偏好伴随着传统的经济网络的发展而发展。

## 七、福岛核电站灾难的影响

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东亚地区,环境社会学家应该做什么?本次会议专门举办了福岛核电站灾难的影响及重新相关问题的专题讨论。堀川三郎(Horikawa Saburo)(日本法政大学)提出东亚地区能源发展战略具有诸多共同点,如核动力的能源政策、核电站的密集部署等。因此东亚地区的环境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电站的安全,鉴于此日本在未来几年能源政策的选择以及日本将如何克服福岛核电站灾难影响的余波,将对东亚其他地区有很大的影响。但在福岛核灾难发生原因和背后的社会运行机制,给亚洲带来的挑战、环境运动/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如何应对灾难、是否影响或改变了我们的环境社会学、是否影响或改变了我们的能源政策、从中学到的教训等问题似乎仍悬而未决,因此环境社会学者仍有必要不断进行交流和研究。

日本福岛核电站灾难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核能政策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多完(KU Dowan)(韩国环境与社会研究所)分析了后福岛时代生态民主观念下的韩国反核运动的特征。福岛事件为韩国反核运动的恢复和核能源政策的变化提供了契机。目前韩国的威权政治发展路线(the development authoritarianism path)正被生态民主路线(Ecological Democratization path)逐步话语取代,在福岛事件后我们可以预见到一个生态民主(ecological democracy)和后核社会(post-nuclear society)的到来。日本福岛事件还奠定了德国能源转型的基本方向,即它的能源将面临一个无核的、安全的未来。盛春红(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用话语分析理论和方法分析了后福岛时代德国能源政策调整的原因。

后福岛时代让人们重新去思考社会价值观、重建食品安全和非自愿移民的重新安置等问题。鸟越皓之(Hiroyuki Torigoe)(日本早稻田大学)以两个社区的饮用水的利用方式为例,分析福岛核电站灾难引起了日本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根本的变化:认识到了现代化设施的不稳定性以及开始对 GDP 竞赛进行反思。闫美芳(日本早稻田大学)以在福岛核灾难事件后茨城县石岗市八乡(Ibaraki-isioka-ysato)为例阐述了有机农户如何对他们的食品安全进行再建构。研究发现,日本的有机农业运动之所以能够做到重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有机的关系”,超然于经济利益之外,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的有机农业运动是建立在消费者与农业生产者的“共存共荣”的关系之上的。福岛核事故的善后工作中,当地居民面临着重建社会生活系统的巨大压力。滨本笃史(Hamamoto Atsushi)(日本名古屋市立大学)对福岛大地震后从福岛疏散的非自愿移民的重新安置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他们大多对现阶段的安置感到满意,然而对于未来将被重新安置在哪里以及何时、如何他们才能决定返回福岛表现出明显的焦虑。

由于人们在福岛核电站灾难中以不同的方式应对放射性污染物,这跟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也有一定的关系。寺田良一(Ryoichi Terada)(日本明治大学),在东京地区进行的对 1,303 名受访者的调查中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的影响很大,中上阶层更容易获得(下转第 179 页)



革派的暴力对抗,还是 1993 年叶利钦炮轰白宫,这种冲突的、非协商性的过渡,其结果更趋向于产生较少自由的制度,反之,合作的、协商性的过渡最容易产生较为自由的制度安排。<sup>[19]</sup>

#### (四)建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的建构对于转型国家的意义尤其重要。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及趋势表明,无所不能的全能型国家的时代结束了。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使得社会更加复杂化,频繁更换的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社会动员能力以及社会服务能力都大大减弱,要想不在国家转型和政府职能转型后出现社会“丛林化”和“无序化”的局面,公民社会(各类自治社会组织)的出场显得十分必要,能够迅速填补原本由政府所承担的功能,使社会保持稳定有序。

在剧变之前,公民社会网络已经开始在东欧一些国家悄然形成,并形成了一股股独立的政治化社会力量,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莱赫·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和瓦克拉夫·哈维尔领导的七七宪章运动,这些政治化社会力量对权力阶层形成有力的监督和制衡,甚至对执政党的权力垄断地位构成了直接挑战。这些力量有的成为剧变发生的直接动因。中东欧国家剧变之后出现了政治参与“井喷”,各类协会、俱乐部等社会组织呈几何级数般地增长,公民积极参与各种社会组织,并介入到各种公共事务中去,参与讨论国有资产私有化、社会保障、社区治理等各类问题。

由于有着数千年的帝国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显得尤为艰难。萧功秦概括总结了从鸦片战争开始经历的六次艰难转型:“一是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期间的清帝国的开明专制化运动;二是民国初年的早期议会制模式;三是北洋军事强人模式(1914 年到 1928 年);四是国民党权威主义模式(1928—1949 年);五是全能主义模式(1949 年到 1976 年);六是改革开放后新权威主义模式。<sup>[20]</sup>然而,历经 150 多年的艰难跋涉,中国的民主转型尚不成熟,中国的现代转型困难重重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公民社会发育严重滞后,无法承担起一个现代国家体制所要求的职责。因此,面对当下的改革困境,培育公民社会应该成为进行改革重要考虑的内容。

参考文献:

- [1]朱晓中编.十年巨变:中东欧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311.
- [2]孔田平.尚未终结的革命——中东欧转型 20 年 [J].南风窗,2010,(12):78-80.
- [3]雅诺什·科尔奈.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4-35.
- [4]孔寒冰.对东欧、中欧和东南欧国家社会转型的考察和思索[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0,(3):105.
- [5]朱晓中.七问中东欧转型[J].同舟共进,2012,(1):5-7.
- [6]金雁.从东欧到新欧洲:20 年转轨再回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60.
- [7]朱晓中编.十年巨变:中东欧卷[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253.
- [8]萨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54.
- [9]冯绍雷.原苏东、南欧、拉美与东亚国家转型的比较研究[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8):8-18.
- [10]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391-392.
- [11]胡安·J.林茨等.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M].孙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48.
- [12]郑永年.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中国改革模式及其未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73.
- [13]古小松.开放——越南改革[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09.125.
- [14]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
- [15]金雁.俄罗斯经济转轨为什么这么难[J].战略与管理,2003,(6).
- [16]Przeworski,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pp.63
- [17][19]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变迁 [M].唐贤兴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7,18.
- [18]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Market, pp.80.
- [20]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24.

责任编辑 王友海

(上接第 161 页)

信息从而关注环境风险,会做出更多的努力去避免这些风险;相反,处于下层的居民获得较少的信息和更少地避免风险的资源,但他们也关心环境风险趋向于对他们造成不利的事实。

东亚地区在环境问题的解决和理论研究等方面虽然有差异,但由于历史相似和地理空间相近等原因,各地区在环境问题的理论研究方面和应对的实践等方面仍有诸多

可以值得借鉴之处。如何在多样性的基础上凝聚社会共识,共同应对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环境问题的挑战,仍然是值得东亚社会学家乃至全世界的学者共同努力推进的事业。

责任编辑 王友海